

Ba Shi Nian Dai Wen Xue Zhi Si

滕云 著

八十年代文学之思

孫犁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天津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

八十年代文学之思

滕 云

(津)新登字(90)009号

八十年代文学之思

滕云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邮编300191)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天津市宁河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9.25印张 490千字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7-80563-222-7/I·012

定价:14.00元

目 录

文学思潮之迹

人性与英雄性..... (3)

提高“改革文学”的典型化高度

——读“改革”题材作家三人谈..... (9)

大文学的时代

——当今文学总体结构的十点变化 (14)

中篇好,其唯中篇而已乎? (21)

小说文化意识的觉醒 (31)

“寻根”的选择 (42)

呼唤史诗 (48)

流派的消隐与找寻 (54)

前卫陷落低谷 (59)

十年树人

——《十年见典型》之一章 (66)

试论新时期作家情感型态分类及其演变 (89)

文学的自失与自寻..... (107)

文学:民族意识与自我意识之价值浮沉 (121)

散文之新之软硬以及人生散文..... (129)

未可据史实以论小说..... (137)

文史分家与历史文学观念更新·····	(148)
故事化—生活化—心灵化	
——历史小说走向管窥·····	(154)
“历史当代化”评议·····	(160)
走出“小儿科”	
——儿童文学琐谈·····	(168)
通俗文学正在起新潮·····	(172)
通俗文学需要提高·····	(176)
从文化角度看通俗文学·····	(182)
批评观与批评主体的演变·····	(188)
批评的主体意识、多元态势与综合态势·····	(194)
文学评论思维规律值得研讨·····	(201)
文学思绪之羽	
在新风吹拂面前·····	(212)
跟进与跨越·····	(215)
形式的压力·····	(220)
“西律意识”辨·····	(221)
秦俑的省思·····	(223)
有感于“诗可以兴”·····	(226)
瞩目于经济巨人·····	(229)
关于写“凡人小事”·····	(233)
文学的“军品”与“民品”·····	(236)
文学的经济话题·····	(239)
经济主体性与主体文化性·····	(242)
文学：生存才能发展·····	(246)
一隅之议·····	(249)
“感觉”与“观察”·····	(252)
读的变迁·····	(256)
“艺术个性”一解·····	(259)

说“距离”	(262)
论时事性作品	(264)
典型概括的三“度”	(267)
“地缘小说学”	(271)
不仅仅为了文学	(275)
作家的履历表	(278)
文学家的知识更新	(281)
作家应当是“高知”	(283)
从托翁对莎翁的批评说起	(285)
话说肖伯纳的器量	(289)
批评的疏离与调节	(292)
文学批评与人间烟火	(295)
也说“深刻的片面”	(297)
旁观者清	(300)
文学思维之象	
时代的脚步	
——近年间报告文学一瞥	(305)
工人创作的新声 工业文学的新页	
——谈蒋子龙的创作	(313)
生活的开拓和心灵的开拓	
——读蒋子龙作品的一点思考	(324)
孔捷生笔下的当代青年形象	(333)
弥漫着新的意识的思维	
——《最后的塍壕》与短篇小说的提高	(360)
把心贴在农民身上	
——读长篇小说《九庄奇闻》致作者	(366)
阿城的“半文化”小说	(370)
创作思维的一种解放	
——谈几篇荒诞品格小说	(392)

乱花渐欲迷人眼·····	(396)
青春作赋 壮岁长歌	
——从一代作家的蝉蜕看新时期文学·····	(407)
历史的前进运动与作家的道德思考	
——说说“王润滋论题”·····	(430)
说实话,申直声	
——读《老荒集》及其他·····	(442)
审美个性与审美选择	
——关于孙犁写“文革”的笔墨·····	(446)
孙犁研究新声息	
——孙犁创作学术讨论会随想·····	(458)
人本主题与社会主题的同构	
——读《大出殡》·····	(467)
三个“经济人”·····	(480)
《黑砂》的新视界·····	(486)
民魂与文魂	
——读《都市风流》有感·····	(490)
生活的选择和人的选择	
——孔令凯等一群小说人物的人本心理分析·····	(495)
文章惜命穷	
——读一份当代知识分子人格变迁的心态报告	
·····	(513)
山林的记忆	
——刘恪几篇小说读后感·····	(518)
写历史,也是写生活	
——读长篇历史小说《庚子风云》(第一部)·····	(523)
《少年天子》的文学启示·····	(527)
《桂系演义》之长短·····	(535)

圣人是人	
——读杨书案《孔子》·····	(540)

新宫闱小说：人·君·人君化	
——读吴因易《则天皇帝》第一、二部·····	(551)

从人生去发现历史	
——读长篇小说《月落乌啼霜满天》·····	(563)

历史向人心生成	
——读长篇小说《山在虚无缥缈间》·····	(571)

读《第三军团》兼谈中学生题材社会化趋势·····	(582)
--------------------------	-------

读袁静的环保童话·····	(587)
---------------	-------

附录

《躁动的新潮》(提纲)·····	(591)
------------------	-------

后记·····	(605)
---------	-------

文学思潮之迹

人性与英雄性

这两年，探讨“文学是人学”含义，探讨人性与文学的关系，是我们的作家、理论批评家普遍关注的重大文学课题之一。其中论题很多，有一个我觉得是颇为重要而没有充分展开的，那就是：“文学是人学”的命题与文学塑造英雄典型的要求是对立的吗？人性与英雄是对立的吗？

回顾建国后的文艺史，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强调写英雄，而忽视英雄也是“人”。“文革”十年更不必讲。这些，事实俱在，大家记忆犹新，可以不加论列。

返观近两年有的同志成文与不成文的议论，答案也似乎是肯定的：强调写“人”，忽视写英雄。他们走向另一端，用人性来排斥英雄性，贬薄文学中英雄典型的塑造，甚至认为提倡写英雄，无异于提倡造神，因而主张我们的文学只应当写“普普通通的大活人”。这，我想与之商榷。

多年以来，迄于今日，我们在习惯成自然地把人性与英雄性分拆开。文学象是一架天平，人性与英雄性被置于天平的两头。分量总是不等，平衡是没有的。无论哪一头加减砝码，另一头即随之起反应，此重彼必轻，此伏彼必扬。英雄性与人性二者的关系，能不能不是这种摆法呢？

我以为，二者本来就不应当这么摆。在社会生活中，英雄本来就是一类人，是人类的一部分，英雄性本来就是一种人性，是人性的一部分。它们的分离，以至对立，是人为的，是复杂的特定的历史条件、社会因素、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把英雄

从人类中分离出去，使英雄与人性对立，英雄就变成神。否则，英雄就还是人，英雄性就还是人性。

鲁迅是并不以为人性与英雄性乃对立物的。他有一首题为《答客诮》的七言绝句云：“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讲得多么明白：威猛如虎者，还时刻顾惜虎崽，大丈夫怎么就不能有亲子之情？真的豪杰并不是无情的人（包括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都如此），无情的人也不会是真的豪杰；取笑别人的亲子之情的人，自己就并非真豪杰。鲁迅多次阐述过这一生活真理，说明天才、豪杰并不通体异于常人，“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并非不与闻人间烟火的怪物；鲁迅还着重讲到如果不表现之所以产生和形成天才与豪杰的土壤、条件，那么所谓天才、豪杰的举动、言语，就会违真实反常理，就会“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见《题未定草》《未有天才之前》等文）。

鲁迅主要讲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英雄与人、英雄性与人性的关系。数十年后，周恩来同志专门讲了现实生活和文艺作品中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人性問題。周恩来同志列举了几种新的“迷信”“新的教条”：①不承认英雄有缺点，英雄人物不许犯错误；②英雄不能哭；③英雄临危的时候似乎只能说“共产党万岁”，否则就是动摇。有一个戏因为写了一位烈士在牺牲前对她的爱人说：“我们要是有一个孩子该多好呵！”就被批评为了英雄的动摇。也不能写英雄临刑时想到爱情，理由是：“视死如归了，还谈恋爱吗？”周恩来同志批评了这些怪论，指出“好多作品在描写先进人物时，把先进人物神化了，”“现实中的先进人物是最平凡最普通的，现实中没有神化人物，”“共产党人是有感情的，”“革命者是有人情的，是革命的人情”（见《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和《〈看豹子湾战斗〉后的谈话》）。

毫无疑问，在生活中，在实践中，英雄性是一种人性，而不是一种神性。英雄性与人性有必然联系，与神性却无必然联系。一

个真实的英雄身上的英雄性是渗透着人性、表现着人性的；同时，一个真实的英雄身上不仅具有这种特殊的人性——英雄性，还具有一般的人性——常人性，二者在英雄活的生命个体内有机地融汇流贯着。

那么，我们的文艺作品里的英雄（这里不包括过去时代的文艺作品和四人帮的阴谋文艺）从人异化为“神”，是怎么造成的呢？简言之，有两种老的新的教条起作用，一是政治上的教条（也包括唯心主义的观念），一是艺术上的教条（也包括艺术修养和技巧的缺陷）。要求文艺从属政治，配合政治，片面强调和只看到文艺的教化作用，把英雄人物奉为传声筒、现身说法者，以为英雄豪杰是能够主沉浮的造物主、救世主，恪守文艺创作的英雄中心论的训戒，习惯从抽象的概念和现成的模式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出发塑造英雄形象……等等，都会把有生命的人写成无生命的神或者戴着英雄冠冕的稻草人。

为了防止我们文艺创作中英雄从人向神异化，为了使神化的英雄复归为人，我想，有如下几点是值得注意研究并加以解决的。

英雄形象所体现的英雄性必须符合和反映人民大众的人性人情。英雄性与人性是对立还是统一，最根本的是看作品塑造的英雄性格是否具有人民性。一方面，英雄的思想、言行、性格，确是代表了民的愿望希求；另一方面，他还必须是为人民所理解、钦敬和感到亲近的。这样的英雄的英雄性，就是具备了最广大的人性的。如果言语行动是平头百姓的思想感情所难以理解的，不能交通、不起共鸣的，那么，这样的“英雄”，大概就已经异化为“神”，这样的“英雄性”，也就很难说是一种人性或人性的一部分了。这是一点。

另一点，作品中的英雄不能一味昂首天外，他应该是脚踏实地的。英雄性与人性是对立还是统一，还要看英雄性格是否具有现实性。这包含着三层意思：一者，英雄的思想、言行、性格，反映了现实生活的要求；二者，他确是在现实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三

者，他身上固然应该有理想的闪光，但他也受着现实环境、条件的制约。三位一体，缺其一，大概“英雄”也会异化为“神”，“英雄性”就会超人性、反人性。因为，英雄和英雄性脱离人和人性赖以依存的此岸世界而走向彼岸世界，当然就只能居于天国而不能活在人间了。

再一点，英雄和英雄性，在概念上诚然是抽象的概括，但在作品中，英雄性格却不能是抽象的概括。作品所塑造的英雄性格，对于读者不能仅仅是理性的对象，必须是感性的对象。英雄与人性是对立还是统一，要看英雄性格是否具有生活具体性。这具体性是指：英雄不是英雄性的集合体，不是英雄性的凝聚物，不是所谓理想的或者标准的英雄性格的缩影和显影，总之，正如黑格尔所说，“不是某种孤立的性格特征的寓言式的抽象品，”他必须是“这一个”，必须是“具有具体的心灵性及其主体性的人”（见《美学》第1卷）。如果作品中的英雄不具备“具体的心灵性”，他就只能是英雄和英雄性概念的人格化。如果作品中的英雄不具备“主体性”，他就只能是“英雄性”寄寓于其中的客体——按着预先编制的程序，储存着英雄信息的机器人。这样的“英雄”，不可避免地就会成为活的人的异化物。

还有一点，英雄性与人性是对立还是统一，还要看作品塑造的英雄性格是否具有丰富性。英雄性格不能雷同，雷同是丰富性的反面，这毋庸赘言。英雄性格不能“净化”，净化也是丰富性的反面，这要作一点解释。大家都接触过这种作品，它们只表现英雄人物性格的一个方面，通常叫做突出英雄人物性格的主导方面、本质方面——突出英雄性格的英雄面。“突出”实际上是独出，因为英雄作为一个人的生活和性格的其余部分，全被掩去割去不得表现。英雄的言行、英雄的性格被从人物的生活的总体、性格的总体中分离出来，予以提纯。其实，现实的英雄，并非英雄性的结晶体。英雄人物性格有英雄性的一面，也有常人性的一面，其英雄性的一面又是和常人性的一面有机结合着生长、有机结合着

表现的。有些作品，却要净化英雄人物性格除英雄性之外的其他“杂质”，制造英雄性的人工合成结晶体。随着性格“升华”为纯粹的英雄性，英雄作为活的人的性格的丰富性也被净化掉了。于是英雄从人异化为神。英雄性格的“净化”是导致神化的重要原因，也是英雄被神化的重要表现。

一个人民性，一个现实性，一个具体性，一个丰富性，假若我们文艺作品中英雄性格的塑造具备这四性，大概也就写出了英雄性与人性相统一的活生生的英雄典型。

话又说回来，塑造英雄典型只表现出英雄性与人性的一致性就够了吗？不够。英雄不是超人，可也不能等同于常人。英雄性与人性相通，毕竟不能相同。否则英雄就与常人无以区别，甚至可能沦于与庸人为伍。这种可能性不是悬拟的。由于对人性人情的理解偏颇，由于对所谓有人性的英雄认识片面，有人实际上是把旧的和新的庸俗气、市侩气，把利己主义、金钱拜物教等等，看作普遍人性，认为要写就只能写具有这样的“人性”的“英雄”；另一方面，则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等等，是反乎人性的，从而认为塑造具有这些优秀品质的英雄形象是“造神”。对“人性”、对“有人性的英雄”的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是荒谬的。

我们既不要把英雄变成飞在天上的神明，也不要将英雄变为爬在地下的庸人。英雄是人中俊杰，英雄性是连根带叶的人性之花。

几年来，这样的英雄形象已经开始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出现。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船长》等等，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西线无战事》等等，话剧《报春花》等等，都塑造了英雄性与人性融为一体的英雄形象。他们人数还不算多，但他们是在新时期文学塑造英雄形象的新路上出现的最初座标。这些作品不以人物地位的高与低，贡献的大与小，业绩的平凡与显赫，行为的普遍与特殊来论英雄。这些作品告诉我们，英雄并不总与高大

完美相连。这些作品的英雄和所表现的英雄性格，没有不是兼备深厚的人民性、强烈的现实性、鲜明的具体性、生动的丰富性的。这些作品还告诉我们，英雄固然不是高大完美的同义词，但他们的人性确实比常人更高、更美；更不必说，他们的人性与小人之性、庸人之性有着原则的区别。这些作品未必是塑造英雄性与人性统一的英雄形象的范本，但它们很好地开了头，开了很好的头。这些作品以它们的成功表明，所谓英雄性与人性各不相容，讲人性就要排斥英雄性、讲英雄就要排斥人性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认为提倡写英雄就是提倡造神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以“文学是人学”为由否定文学塑造英雄典型的主张，是没有道理的。

新时期的文艺，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事业中，负有重要的责任。为了承担这一重要责任，不是说只能塑造新时期的新人和四化建设创业者的英雄形象，在这个问题上形而上学的理解和短视的眼光，其弊端是显然的；但同样显然的是，应当鼓励文艺家在描写新时期的新人、塑造四化建设创业者的英雄形象上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样的新人和新英雄，体现了新的人性和人性的新内容，体现了新长征中英雄性的新发展和时代精神的新发展，并且体现了新时期文艺的新特色新阶段。

(1981. 3. 7)

提高“改革文学”的典型化高度

——读“改革”题材作家三人谈

最近读到三位擅长写“改革”题材作家的创作谈，现在让我从中各提取一点意思，加以生发，串成此文。

这三位作家是张贤亮、水运宪、陈冲。张贤亮文章题为《当代中国作家首先应该是社会主义改革者》，我想就中引发的那点意思是——

艺术的永恒与瞬间的现实性

他的原话是说：“我不追求艺术的永恒，我只追求我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一瞬间的现实性。”“只要我们牢牢地把握这一瞬间的现实，我们也可能获得永恒。”（《百花洲》1984年第2期）

这话我想不是空论，乃是作家有感而发的。艺术的永恒性与现实性的关系这个并不新的问题，在今天正有新含义。

随着改革之风吹遍中华大地，写改革的文学的价值，大概不会被公然否定了；但在文学圈子里，在追求“艺术的永恒”者心底，是否明暗暗地仍有以睥睨“时文”的眼光去看“改革文学”的呢？未必没有。“‘改革文学’好是好，时过境迁长不了”，其所谓也。

另一些作家却基于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学信念，坚持以“时事”为文，坚持写“时文”——以正在发生、正在眼前进行的时代生活为素材和题材，写近距离反映并作用于时代的文学，例如写“改革”的文学。